■基本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郭建宁

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特点

随着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战略的部署，中国哲学从“文革”的历史灾难中走出，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哲学课题的价值与哲学工作者的视野，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总的看，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从本质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体现了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1）反思精神，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2）科学精神，即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3）实践精神，即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4）开放精神，即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同时，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从内容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全面推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全方位的，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交流对话、综合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和新型学科的研究，如：实践哲学、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生存哲学、生态哲学等。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再次，从具体范式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路径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特点，有的强调把握“真精神”，有的主张凸显“现代性”，有的立足推进“中国化”，有的重视建构“新形态”。这就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真精神（文本研究）、当代性（对话研究） 中国化（本土研究）、新形态（综合研究）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这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从思维方式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重大转换。

谈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许多学者喜欢说“转向”，比如从本体论到生存论转向，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转向，还有价值论转向，人学转向等等。我以为理论折射到实践中最重要的转向是两个：一是阶级性思维方式的转向，表现为从阶级分析到利益分析；从阶级性到先进性；从阶级性至上到以人为本。二是两极化思维方式的转向，表现为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从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从压倒性思维到共生性思维。无论从时代潮流看，还是从中国实际看，这都是不可低估的伟大历史进步。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面临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令人瞩目的发展，同时面临严峻的挑战和突出的问题，这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进一步加强，但沟通并不顺畅，常常是“自说自话”。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大基本思想流派。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都有自己的受众群和话语体系，虽然大家都重视对话，但是实质性的沟通进展不大，许多问题都还没有破题。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张岱年先生曾提出“综合创新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统一，综合创新。即经过“同情的了解”，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最终实现符合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这个方向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操作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上和思路上。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凸显，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出现经院化的趋向。

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的特点。必须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紧扣时代的脉搏。必须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回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而现在的一些哲学研究和哲学论文，一方面自我陶醉于“学术思辨”，一方面却是“自我放逐” 越来越经院化、小众化、边缘化。一些问题看起来争的很热闹，但是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充其量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什么作用和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格格不入。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项目、课题、经费不断增多，但低水平重复比较普遍。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视角与现实关注的统一。这就尤其需要理论创新，特别是防止低水平重复。现在的课题、项目、工程很多，论文、著作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却多见横向挪移，鲜见纵向提升，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相当严重。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含量和学术品位，克服低水平重复，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重大课题，也是关键所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在新的历史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是应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考虑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全球化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游离其外，必须加强对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趋利避害”和“有选择进入”，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你不进入主流，只能永远居于边缘，永远落后。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时代的“语言霸权”已经确立，游戏规则也已经制定，因而在进入主流和中心的过程中，就可能不得不受制于人。如何恰当地处理全球性文化与民族性文化、全球价值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无论是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是应当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与文化格局中来考虑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只是最近三十年的事。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就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并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时，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使得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中国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现代化进程中历时态矛盾在中国的同时态展开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造成了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极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它使我们一方面要改造传统，摆脱贫困，尽早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而焦虑，为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矛盾而困惑。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前现代思想资料的儒家哲学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却不能成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三是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要求来考虑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着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临着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从而对一系列新的课题做出新的回答。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僵死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社会现实中的新问题，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意识，宽容的精神，平和的心态，维护学术自由，提倡学术争鸣，在探索与争鸣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新世纪论坛

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

□张晓林

自1982年初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来，工作单位和部门有所变动，但不变的是始终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字写作。在这二十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写作实践中，如果说能给我一些值得铭记和珍视的经验的话，那么我最想说的就是：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也可以这样说，从问题出发研究理论，或者理论研究要立足于问题，是我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与写作实践的认识结晶。这一认识结晶谈不上有多么智慧、多么深刻，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是真真切切的，没有半点水分和虚伪，也没有丝毫的哗众取宠。

为什么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这要从理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两方面去讲。

从前一个方面来说，理论的功用和意义在于面对问题，说明问题，述说问题的来龙去脉、产生的缘由以及走向。毫无疑问，理论是有好坏、真假、高低之分的，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问题的一种说明。好的理论、真的理论、智慧的理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的理论，是对问题客观、真实、准确的说明；而坏的理论、假的理论、愚蠢的理论，也就是非科学、反科学的理论，则是对问题主观、虚幻、歪曲的说明。可以这样讲，只要是理论，都离不开对问题的阐述。从问题出发，不一定就是科学的理论，但科学的理论首先要从问题出发。从问题出发，才能一步步地走向科学、构建科学；不从问题出发，不仅和科学南辕北辙，而且本身也离理论相去甚远。毛泽东同志曾经运用“有的放矢”的典故说明理论，“的”就是问题，“矢”就是理论，要用“矢”去射“的”，也就是要用理论去说明问题。可见，有“的”才有“矢”，才能放“矢”；有“问题”，才有“理论”，才有理论的运用。当然，这里还有“箭矢”能否射中“靶子”的问题，这就又产生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反科学理论的分野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理论要面对问题，为问题而存在、为问题而演绎这一理论本性。人们常说，自然科学起源于好奇心，起源于问题，其实社会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同样有着无数的奥秘和问题，同样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人们去揭示问题的真相。古往今来；悠悠数千年，社会科学理论王国的庞杂是人所共知的，有的生生不息，有的昙花一现，有的早已销声匿迹，但这一切却都是在面对问题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既可以说是个人经验的感悟和体会，也可以从历史和实践那里得到有力的佐证。

从后一个方面来说，从问题出发研究理论也是人的需要。人的生存和发展是被问题紧紧缠绕和包围的。人们通常讲生活、讲实际、讲现实、讲历史，其实都是在讲问题。因为，生活、实际、现实、历史都是由问题构成的，都是以问题为要义、为内容的。离开了问题，生活、实际、现实、历史都是空洞苍白的，甚至都是不存在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都要面对一个个问题；只有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人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人人如此，概莫能外。那么，如何认识和解决问题？自然首先要靠理论，只有理论才能告诉人们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一诞生就有了理论，而且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由理论伴行，由理论引导。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要理论，人们的需求之中就包含着对理论的需求。因为，只有借助理论的工具，才能认识和解决问题，才能维系大到人类社会、小到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讲，人们需不需要理论不是个问题，或者是个假问题、伪问题，严格说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问题的真正区别不在于需不需要理论，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不少人可能会看到人们对理论冷淡和疏远的现象，以致发出“理论危机”的感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该讲，人们冷淡和疏远的是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就是无用处、无帮助的理论，而不是理论本身。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启迪人、引导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不仅不会受到冷淡和疏远，相反会受到追捧和崇尚。理论所具有的魅力和力量，就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以，借助理论认识和解决问题，是人们的需要。显而易见，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既有理论本性的原因，也有人们需要的原因。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说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你认识、分析、说明的问题越多，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越多、越好、越高。是不是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不高，并不在于说的好不好、多不多，而在于是不是能够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从问题出发研究理论，并不是说可以解决理论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从问题出发，还不能完全解决理论的真善美问题。从问题出发，仅仅是解决理论真善美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量事情要做。但从问题出发，却是理论研究走向理论真善美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和离开了这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达到理论的真善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这是作者（《求是》杂志总编辑）《从问题出发》一书的自序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刘少奇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贡献

□范守信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以长于务实，善于理论思考和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难题著称的刘少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探索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任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随之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确判断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其主要矛盾，是党确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前提，十分重要。

刘少奇历来重视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认为这是党在复杂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在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不犯错误的根本保证。当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展开的历史关头，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即将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做了正确分析，对党的八大路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向党的八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已处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力量空前壮大。“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60年代阶级斗争日益升温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上述正确探索，力排干扰，尽最大努力保持党的工作重心不偏移。1962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刘少奇在大会结束时提出，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主要是大讲阶级斗争的精神的传达应当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意“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尽可能地使正在紧张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按原计划进行，保证了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

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后，在经济建设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这是刘少奇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刘少奇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重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发展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意见为八大所接受，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被写入大会有关决议中。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57年经济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一五计划期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它本身固有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刘少奇较早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并在1955年底着手调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奇在向八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他说：“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他提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推向前进。”

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事实，他提出在公私合营前限制资本主义商业的许多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针对过去对工商业、农产品购销限制过严过死的缺点，他提出“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刘少奇的这些认识，已经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所有制构成十分单一。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就指出，只要社会需要，私人就可以开工厂、开商店。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刘少奇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中提出了私营企业的问题。“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

1957年2月，刘少奇在和劳动部部长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还不禁私人雇请工人进行生产，允许一些私人生产事业的发展也还有一些好处。”3月，在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又提出“工商业黑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这个问题要研究。 “有人说，好处是满足了市场需要，纠正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如果是这样，那很好。” “他能赚一点钱，就说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有空子，既然有空子，就让他钻，以便补充我们的不到之处。”4月27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产生地下工厂是不可避免的，要允许它们存在，以辅助我们当前经济上的不足。给资本主义经济一点活动余地，这样就不只是有计划性，而且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更好。”

刘少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应当是多种，而不是一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论述，其正确性、前瞻性已为今天的现实所证明。

五、关于对外开放和向资本主义学习

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刘少奇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外开放，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

1955年12月，他在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自己没有的技术，可以向别的国家去要资料，可以派学习小组赴国外去学习，可以请外国专家、技师来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量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习。必须咬紧牙关，发一点狠。”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开放的态度，认真向其它国家学习，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可以说，刘少奇很早就看到了开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结束，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7年2月，刘少奇率领调查组沿京广线南下，深入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他指出，由于阶级矛盾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前各级干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掉以轻心，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引发群众闹事。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矛盾，确切地说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上。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从领导上解决认识问题。如有的同志不把自己看作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当官做老爷，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没有闹事时对出现的问题置之不理，出了事又惊惶失措，采取压制的办法。

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只能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加以解决。即采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说服教育。

从1956年开始，刘少奇以其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力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比较完备的路线”。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令人痛心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刘少奇的探索，他本人也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残酷的政治和人身迫害。

今天，在刘少奇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我们不能不深深怀念这位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先驱者。